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

——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汪 丁 丁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body of literature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in the last ten years supports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1) There are much closer connections between rational choice and moral judgement than traditionally thought; (2) Such connections are formed during the long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3) For human species the brain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are co-evolutionary; (4)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foundation of moral judgement are “theory of mind” and social cognition; (5)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found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are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 These propositions have been explained in the so-called the “third culture” rhetoric which differs from that of scientific (the first) culture and the humanity (the second) culture. The third culture is itself an interdisciplinary rhetoric and dialogue of logos.

我打算讲的这个题目,其实还受到你们这里一位老师、我的朋友、哲学家陈嘉映的影响。两个月以前,我们邀请他到浙大来进行一次“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在那次对话中,他提到从哲学角度看,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第一种文化是自然科学的,第二种文化是人文叙事的,它们之间长期争论不休。当时,我补充了一句,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不过,因为这一话题与我们当时的对话不甚相关,我就没有具体谈第三种文化的视角。这一次,许纪霖教授邀请我来做一个报告。我觉得应该把我的报告题目与“第三种文化”的论域联系起来,这样,就有了现在这个“副标题”。

其实我的报告主要是围绕主标题——“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展开的。显然,在西方思想传统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它们在1990年代以前也确实是相互隔离的两个研究领域——关于“理性选择”的讨论基本上是在第一种文化里进行的,关于“道德判断”的讨论则主要在第二种文化里进行。

我从我2003年秋季给北京大学“社会思想研究班”讲过的15套幻灯片的几百张幻灯里挑出60张左右,给各位作一概述性的报告,关于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论述。

理性与道德,这两个互相纠缠的主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逐渐清晰起来。首先当然是“理性”概念,它不再被我们当作康德所论的“纯粹理性”来讨论了。让我借用哈贝马斯在1994年英文版《后形而上学思考》里论述的概念“situated rationality”,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作“情境理性”。但从认知科学角度说,这种理性是“场景依赖”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关于“道德判断”,也已经背离了康德的 tradition。今天,我们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与哈耶克的工作密切相关。哈耶克把道德看作是 social evolution 的产物,不再如康德所论,是纯粹理性在人间的实践。这样,静态的道德就转为演化的道德。哈耶克的这一思路能够回溯到达尔文那里,后者认为人类道德与动物道德之间没有隔着深不可测的鸿沟,二者间是一个连续过渡的谱系。这当然是一个不很让人高兴的看法。所以,达尔文也始终没有公开表达过这个看法。到了今天,许多动物学家,特别是动物行为学

^{*} 作者注释:这是我于2003年12月23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因篇幅和版式限制,大部分介绍最新脑科学文献的内容和附录都被删去了,为保持叙述的连贯性,我以极端简约的方式对删去的内容作了概括。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未经校对演讲稿全文。

家,已经开始公开地争辩说:动物也有道德。

天上星空与心中道德,如果你读过康德的“三大批判”,你或许知道,它们在康德那里也是相关的。许多社会理论家今天承认,理性要依赖于场景(情境)。随着场景的演化,我们习得了被称为“理性”的那种恰当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看法,实质上意味着理性和道德已经无法完全截然两分了。

所以,我首先提出两个半问题,最后那个问题无法称为一个问题,所以是“半个问题”。理性是如何依赖于情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道德是如何演化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康德错了吗?这是半个问题,因为它或许不应该问。

我今天的报告,结论其实只是一句话,说出来稍微长些:一方面是情境的理性和不断在情境里作着判断的道德自我;另一方面,是在许多自我的符号交往中不断重塑自身的自我。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构成我们每一个自我的生活体验与知识过程。你如果能理解这句话所陈述的事实,你就明白,这其实是“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之间长期冲突。坚持第一种文化最彻底的是物理学家,他们使用数学语言,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按照华勒斯坦的知识谱系学回顾,从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传统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两种文化就已经相互冲突了。当然,华勒斯坦的回顾很尖锐,他认为这一冲突使得我们当代大学的院系逐渐出现了僵硬的学科划分。比如“文、史、哲”,使用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种语言,一种人文叙事的语言。而“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使用了另一种语言,它们更强调实证方法,试图寻找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性。在西方的大学里面,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导致了按照学科和院系划分势力范围的所谓学科划分,其实就是保护大学里的既得利益格局。并且,大学总是按照学科划分来配置资源和培养各自学派的接班人的。我觉得,如果今天有经济系的学生来听我的报告,听到此处,他或许会对我这样的语言嗤之以鼻,因为他觉得他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我使用的这种批判性和拆解性的语言。我的言说与经济系课堂里的言说,不在同一个文化传统里,不在同一个语境内。

这样两种文化之间的长期冲突,其知识论和语言学前提,我用幻灯片上显示的前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概括是我阅读维特根斯坦在195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伦理学讲义”第一部分的感受,其实,他似乎只发表了这一个“第一部分”。我把他这篇讲义的几段话显示在下面四张幻灯片里,以支持我的由三句话组成的概括:(1)语言只陈述事实;(2)对语言的领悟导致了意义;(3)先在的意义体系重塑语言所陈述的事实。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凡能说的,都是关于事实的陈述。我们知道,第一种文化的叙事者们经常采取这样的立场。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凡说不出来的却被人说出来了,一定是荒诞的,但这是一种有深刻意义的荒诞,它把领悟带到言语之外。我们知道,第二种文化的叙事者们喜欢采取这样的立场。第三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从话语中所能领悟到的意义一定受到我们已经接受的意义体系的影响。请各位自己阅读下面的四张幻灯片,想一想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如此言说。那些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无法打动我们,除非我们对那些思想有过思想。

语言只陈述事实,而无法说出意义。但我们还是知道了意义。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有领悟的能力。我更愿意把领悟称为“感悟”甚至称为“直觉”。凭了这一能力,我们能从被说出来的话领悟话外的意义。显然,人文学者的大部分话语,都被概括在维特根斯坦这第二句话里面了。引用孙周兴的话,就是“说不可说之神秘”。

第三句话是第三种文化的叙事者们试图表达的一个事实,即无论你怎么领悟话语的意义,在此之前,你已经接受了一套意义,于是你的任何领悟都要受到先在的意义体系的导向。所以,尼采说,不存在“如此……这般”的事实,或者说没有纯粹的“事实”。波普在他和芝加哥大学一位脑科学家合著的《自我及其脑》里有过类似的表达:“There is no data as such”,即“没有只是如此的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在特定意义体系的阐释下被建构出来的。

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最重要的第三种文化的叙事者,下面这张幻灯片显示他写的几段文字。今天也许还有机会介绍另外几位科学家兼哲学家,例如波尔·萨伽德(Paul Thargard),他们都主张对意义和事实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反思,然后以“科学家—哲学家”双重身份对大众发言,写科普著作,阐释下列问题:(1)意识的本源,(2)道德哲学的基础,(3)人生意义。在我看来,这也就是“第三种文化”的阐释。

第三种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它的叙事者们降低了西方主流媒体在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时对人类基本经验的可能歪曲,同时他们也澄清了在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相互冲突中产生的大量误解。我不打算讨论中国的媒体,就以《纽约时报》“科学版”为例吧,这是西方社会最好的媒体之一,它有出色的“科学”版面,但它的许多作者毕竟只是记者而不是学者,所以也常常会犯一些错误,扭曲了来自科学的基本经验。可是直到20世纪末叶,才有了第三种文化的兴起。当代有思想的人,若只接受过1950年代以前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现代主义的各种教育,那么他在1990年代就会感到欠缺思想者的资格,他应当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了。我在2003年12月16日用google搜索“第三种文化”关键词,为各位找到了一些阅读资料,主要是四篇。^①

现在,我打算介绍三篇最新发表的脑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我通过北京大学接入Elsevier数据库下载的,那个庞大的期刊数据库里有1600多份最新的学术期刊,通常是最近三年内的,包括已经被接受发表的论文,例如,现在是12月份,那么,可能将在明年2月份发表的论文也被挂在这里了。所以,各位看到,这是一篇2003年12月份,也就是上一星期刚刚发表的论文,已经全文显示给我们了。这三篇文章的第一篇发表于2003年6月份的《科学》(A.G. Sanfey,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vol. 300, 13 June, 2003);第二篇发表于2003年12月份的《认知科学发展趋势》(J. Decety & J.A. Sommerville, “Shared Representa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A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iew.”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7, no. 12, December 2003.);第三篇发表于2003年10月份的《科学》(N. I. Eisenberger, et al., “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vol. 302, no. 10, October 2003)。下面,我介绍它们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论文显示:即便是最简单的博弈过程,也可以激活自我的“社会认知”能力,而且使理性选择显著依赖于社会认知过程;第二篇论文显示:社会认知过程需要激活脑的下列三种功能:(甲)“自我意识”,(乙)“场景记忆”,(丙)“他心理论”。从而自我与他人通过场景建立交往关系;第三篇论文显示:当自我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时,将激活与物理疼痛相似的痛苦,从而产生相应强度的情感波动。这三篇论文意味着理性与道德的纠缠。

第一篇论文与实验经济学关系密切,与我们今天讨论的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主题密切相关。主流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坚持“理性选择”假设的学者们,他们不愿意承认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有任何关联。用休谟的话,前者是“实然”的,后者是“应然”的,从实然不能推演出应然。科学家不关心应然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是“价值中立”的。基于理性选择的价值中立立场,经济学家们推演出一套完美的理性选择模型。很遗憾,这些完美的模型最近遭到了来自实验室的事实和来自现实生活的事实的严峻挑战,发生了“危机”。

① 这四篇资料是 (1)The third culture consists of those scientists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who through their work and expository writing, ar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in rendering visible the deeper meanings of our lives, redefining who and what we are; (2)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laying field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has shifted, and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A 1950s education in Freud, Marx, and modernism is not a sufficient qualification for a thinking person in the 1990s. Indeed,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re, in a sense, increasingly reactionary, and quite often proudly (and perversely) ignorant of many of the truly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s of our time. Their culture, which dismisses science, is often no empirical. It uses its own jargon and washes its own laundry. It is chiefly characterized by comment on comments, the swelling spiral of commentary eventually reaching the point where the real world gets lost; (3)In 1959 C. P. Snow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The Two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th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on the other, the scientists; (4)In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published in 1963, Snow added a new essay, “*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 in which he optimistically suggested that a new culture, a “third culture”, would emerge and close the communications gap between th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cient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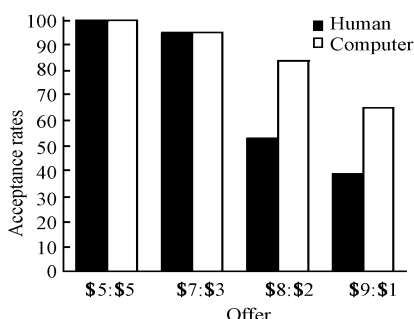
实验经济学家检验理性选择模型时最常使用的是所谓“最后通牒”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他们表明：理性选择其实与道德判断和社会认知紧密纠缠着。“最后通牒”的博弈实验已经被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了，它的规则是：两个受试者瓜分一笔钱，比如说，100 美元。这笔钱应当足够大，提供足够的诱惑，而且在实验结束后当真支付博弈各方的收益，否则就难以诱使受试者认真选择——理性选择是需要认真的。实验者先让第一个受试者对这笔钱的瓜分提出一个方案，例如，90 美元对 10 美元。然后，实验者让第二个受试者作选择，即是否同意这一方案，如果不同意，那么双方收益都是零。如果后者选择“同意”，那么双方就按照这一方案来分配收益。这一博弈是一次性的，第二个受试者选择之后，博弈结束。

由于这一实验的简单性，它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比较公平的分配方案最容易被双方接受。越是不公平的方案，被拒绝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许多最后通牒实验都是以“对半分”为双方认同的分配方案的特征的。这一结论不仅在实验室如此，在过去十年里，由桑塔费学派的学者与几所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教授们，在地球上选择了 15 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真实的小型社会——例如，阿拉伯社会、未开化的部落、南美的游牧民族，等等，所得的结论与实验室里得到的结论非常接近。但是我们都知，第二个受试者哪怕得到 1 美元的收益，也比完全没有收益要“好”。为什么比较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例如 \$80: \$20，在很大概率上会被第二个受试者拒绝呢？难道他的公平感甚至道德感影响了他的理性选择吗？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难以承认的一项猜测。其实，这一猜测很合乎我们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更合乎公平原则的分配方案比一个非常不公平但对自己更有利的分配方案要好，尽管后者比前者更符合“自利理性”原则。当然，经济学家们对这一实验的结论提出了许多辩解，其中不乏令人信服的，但毕竟已经成为辩解，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自明”的了。

这篇论文今年 6 月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向我们报告了“最后通牒”博弈的最新实验结果。这表明自然科学的叙事者们已经愿意面对如上所述的事实了。在这篇论文所报告的实验中，电脑系统先用 12 秒时间把受试者们两两配对。每一受试者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对手并辨认出对手的身份。博弈参与者可以是真实的“人”，也可以是“电脑”。有一组以真人为对手受试者，被允许在屏幕上看到对手的面孔，如同面对面的博弈那样。这样，如果他喜欢这张照片上的对手，或许可以同意留给对手更大比例的收益。与此对照的，是另一组受试者，他们在开始时被告知将要与一台电脑博弈。这样的对手，没有人类情感，完全服从理性原则，不论人类分配给它多么小的比例的收益，它都会“同意”。当然，它的对手们也不会把它视为人类，从而不会预期它有公平感。这样，电脑的对手们很可能会接受无论多么小的收益分配比例。

现在，从第二个时间单位开始博弈，第一位受试者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孔，然后，在 6 秒内，他必须选择一个分配方案。接着，第二个受试者有 6 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他是否接受这一方案。如果他选择“同意”，那么博弈结束。如果他选择“否决”，那么博弈结束。如果 6 秒时间内他没有决策，就被认定选择了“否决”。

在下图中，纵轴标明四种不同比例的分配方案被否决的百分比，其中白色条形表示对手是电脑，显然，与对手是人类（黑色条形）时相比，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被接受的比例高得多。而且，越是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一比例的差异就越大。



这篇论文的作者们使用核磁共振脑功能成像仪记录受试者脑部区域的激活状况。如“附录一”脑示意图 A 和 B 显示的，对手是人类四种不同收益比例的分配方案都强烈地激活了下列三个脑区：

(1) 两侧前脑岛叶，(2) 两侧前额叶背部，(3) ACC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其中，ACC 是脑科学家们所推测的人类“自我意识”的中枢，它与人类道德判断密切相关。而两侧特别是右侧前额叶背部和右侧前脑岛叶，则与人类的社会认知活动有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采用纯粹的理性选择模型而不考虑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然后根据这一模型对人类行为

加以预测,那么,我们所预测的人类行为将与这一实验中的电脑对手差不多。也就是说,与这一实验中的以人类为对手的受试者的行为模式相比,我们的预测肯定会发生系统性的偏差。如果发生了这一系统偏差,脑功能成像告诉我们,是因为社会认知与道德判断对人类的理性选择过程发生了强烈影响。因此,“最后通牒”实验对于那些打算继续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理性选择”派学者们确实构成一种挑战。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篇论文。这是2003年12月份发表的,在此之前,也就是12月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庆祝10周年生日,邀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史密斯(Vernon Smith)来作演讲。史密斯得奖,是因为他参与开创和系统发展了实验经济学,所谓“亚利桑那学派”。他演讲之后,我们在一起吃午饭,我被安排跟他讨论更深层的学术问题。我们谈了很多主题,谈了很长时间。他不仅注意到脑科学的最新发展,而且正努力把脑科学方法应用于他的实验经济学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被我的助手直译为“神经经济学”的经济学领域,探讨经济行为的脑神经学原理。他指导的“最后通牒”实验,也使用了脑功能核磁共振来观察受试者脑区的活动。虽然他的研究报告还没有发表,不过从他告诉我的那些结论看,与上面介绍的那篇论文的结论很接近。

核磁共振技术让我们可以观察脑的分区活动。脑科学家们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详细刻画了诸如左右半球、额叶、顶叶、枕叶、颞叶的脑功能。这些研究显示,在例如“最后通牒”博弈的理性选择的脑活动时间内,例如,当你正在选择“同意”或“否决”时,你的大脑的额叶部分,在功能上是负责“计算”的,被激活的程度其实不很显著,甚至没有被完全激活。而你的道德判断的脑区,如上述,是被强烈激活了的。

第二篇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正常人在从他人角度回答问题时,前额叶前回大面积激活。前额叶前回发生残障的人则完全从“我”的角度回答他人角度问题。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如果对方不是电脑并且提出不公平分配方案,则激活的脑区包括“自我意识”(ACC)、“场景记忆”(情感波动)、“他心理论”。

这是一篇综述性报告,它提供的脑示意图(见“附录二”)显示了两个白色的亮区,其中位于上方的,就是我们说过的“ACC”——自我意识的中枢,位于下方的亮区则与“他心理论”密切相关。“theory of mind”,直译“他心理论”,意译则是“关于他人心灵的想象力”。我们知道,哲学家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你怎么知道别人是独立于你而存在的另一个人呢?

他心想象力,人类独有,人类的近亲如黑猩猩,似乎没有。灵长目里面如恒河猴这样的高级动物,已经发现,它们有“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在它们的脑区里大致是在额叶附近,也包括颞叶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让恒河猴能够模仿其他猴子的动作,它是被其他猴子的动作激活的。更低级的动物,脑内缺少这类镜像神经元。我们可以推测,镜像神经元的进一步演化,到了人类这样的物种,就出现“他心想象力”这样的脑功能。

我们人类在2岁到5岁的时候,开始获得他心想象力,开始意识到别的孩子是独立于我们的自由意志而存在的。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懂得,别人是另外一个“我”。或者,用舒茨(Alfred Schuetz)的表述,别人是“other self”——他我、变形的我。只有在他心想象力的基础上,关于“社会”的意识才可能发生。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的本质。

继续讨论。在白色亮区的下侧,也就是“前额叶”——这里是“他心想象力”所在的区域。激活了他心想象力的同时,还激活了前额叶腹侧和扣带回之间的一个区域。后者与“社会认知”密切相关。

这个实验表明,正常人在从他人角度回答问题时,前额叶前回(又译作“眶前额叶”)被大面积激活。而前额叶前回发生残障的人,则完全从“我”的角度回答那些需要从他人角度回答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不正常的行为。

我们回顾第一篇论文的内容: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对手是人类时,被不公平分配方案激活的脑区包括“自我意识”(ACC)、“道德判断”、“社会认知”。我们从社会思想领域的许多文献可以知道,道德判断也是一种脑神经元活动。这一活动要求两种能力:其一是自我意识,另一是他心想象。

附录二的脑示意图左侧,靠近枕叶和丘脑有两个白色的被激活的区域。那个比较接近中心区域的

最重要,它就是我今天报告的核心概念“场景记忆”活动发生的脑区。

场景记忆也可以翻译成“情境记忆”。不过,我更喜欢用场景记忆,可以与动物行为学里称作“场景知识”的概念相通。场景记忆非常重要,它在人类的社会认知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被激活,它是人类“长期记忆”的一种类型,它是各种长期记忆中惟一能够把记忆主体带回到“过去”的记忆。注意,其他类型的长期记忆都没有关于“时间”的感受。

只有场景记忆能把我们带回过去的场景中去,让我们感到“亲切”、“温暖”、“私己”。所以,它也被称为“wam memory”——暖记忆,而不是“cold memory”——冷记忆。

我从《MIT 认知大百科》里,为你们抄录了关于场景记忆的专门词条,大致如下:场景记忆是人类独有的,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只有两种记忆被保留下来。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另一种是场景记忆。

语义记忆是一种符号记忆,也是长期记忆能力之一。它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记住语法规则和道德准则,需要记住行动的一系列步骤,这些记忆都以语义记忆为前提。

但是语义记忆不能把我们带到“过去”,它不给我们“时间”的感受。例如,你见到一个“认识”的英文单词时,马上意识到你认识这个单词。但是,你未必能记住你是在什么“场景”内,是谁、怎样教给你认识的这个单词的。你之所以只有关于这个单词的语义记忆而没有场景记忆,或许因为场景记忆能力太宝贵从而那些对你的生命并不很重要的单词不能够进入场景记忆,又或许因为你学习那个单词的时候,并没有情感投入。

场景记忆比语义记忆更深刻,更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私己经验。它让我们回到“童年”,我们戏耍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有一位亲切的长者,教给我一个单词,让我受用一生。这样的描述里面,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它是我们个人情感的一部分。

当我们从事社会认知和道德判断时,我们脑的上列部分被激活,于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情感方面有所卷入,我们被记忆沿着时间带回到了个体经验的特殊场景内。因此,社会认知与道德判断几乎总是情感生活的一部分。

在讨论第三篇论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大致讲解一下人脑的社会认知功能区。下面这张脑图(见“附录三”),它的英文名称是“社会脑”——social brain。它显示人脑的社会认知活动所涉及的三个主要部分,都位于前额叶:(1)他心理论,我们讨论过了;(2)“medial frontal cortex”——直译为“前额叶中部”,与社会认知有关;(3)“orbital frontal cortex”——就是所谓“眶前额叶”,它在额叶的腹侧部,即眼眶的后面,它是我们的社会认知和道德判断所激活的脑区之一。从文献阅读,我们知道,这一区域与人类对面部表情的认知过程密切相关。例如,当你看到另一个人的痛苦表情时,你首先意识到他面部有了某种表情,这是社会认知的开端。哺乳动物似乎都具有这一“开端”的能力,因为它是基于脑的深层结构之一——“杏仁核”的一种可以叫做“本能”的认知能力。而杏仁核出现在物种的哺乳动物演化阶段,也就是说,哺乳动物的脑,有杏仁核。其次,你的他心想象力让你产生一种“同情”。最后,你必须判断这个人是否当真痛苦。我们的同情心产生于脑的另一深层结构,姑且叫做“颞叶—顶叶—枕叶”联合区。从功能上讲,颞叶负责听觉,顶叶负责触觉和行动,枕叶负责视觉。所以,这一联合区也可以叫做“视—听—动”联合区,它的功能是帮助人类进行他心想象与情感判断。

现在我简要介绍第三篇论文。这是 2003 年 10 月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作者们研究了当“自我”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时的脑部活动。受试者当中有一部分是精神病患者和脑损伤患者,因此实验是在精神病医院里进行的。这里涉及的实验方法比较多,典型如“游戏”。在一个游戏中,受试者可以被其他游戏者排斥出去,于是,产生“痛苦”,这类痛苦在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经常发生。附录三第二张脑示意图表明,当受试者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时,他们的“ACC”自我意识(见图 A 黑色区域)和右前额叶腹侧(见图 B 黑色区域)都被激活,而这一状况与个体受到物理折磨时被激活的脑区状况非常类似。这意味着,个体在遇到社会排斥时,感受到的痛苦的强度,与受到物理伤害时的强度是相似的。我引述这篇

论文,目的是要说明我们人类具有极强烈的趋社会性,其强烈程度不亚于我们肉体求生存的欲望的强烈程度。

以上是“导论”,它告诉我们理性和道德是如何相互纠缠的。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思想史家所说的“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因为这涉及到我一直在批评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网上与大家讨论过,当时,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为了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界定“经济学”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任何超出适用范围的经济运用,就被界定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如何为经济学划定它的疆域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理性选择”加上“实证分析”。只要满足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只要适合于运用这两项基本原则的领域,都可以成为经济学领域,或者说,经济学家都可以合法地进入。惟其如此,如前述华勒斯坦的文章所论,西方的经济学便开始渗透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领域。事实上,“理性选择”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最基本的模型了。

凡是不适用这两项基本原则的领域,例如,对梦境的解释,很难实证,又例如,对图腾的崇拜,很难符合局外人的理性解释,这时,如果我们非要运用经济学原理,就可能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我们知道,经济学所谓的“理性”,是韦伯论述过的“工具理性”,用诺贝尔经济学家森(A. Sen)给出过的生动描述,工具理性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凶手正在用一把钝刀子杀人,如果你遵从工具理性,那么,你会立即找到一把更锋利的刀递给凶手,并且对他指出,如果他追求更有效率地行凶,那么他就应当使用这把更锋利的刀。

金迪斯(H. Gintis)是桑塔菲学派的一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他与另一位学者合著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已经被韩水法教授翻译成了中文。金迪斯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里论证了一个被叫做“社会学基本定理”的看法,他论证,如果一个社会都是由自利主义者构成的,那么,长期而言,这个社会将消亡。而如果一个社会,通过“说服教育”以及其他说教机构的努力,长期保持一定比例的他利主义者,它就能够在稳定地繁衍下去。

在经济学里,你们或许听说过,有一个所谓“奥地利学派”。那个学派里有过一位奇怪的思想家,沙克尔。他曾经是哈耶克的博士生,后来又去凯恩斯那里做研究。在进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前,沙克尔接受了现象学和“维也纳小组”的影响。基于这样一种经历,他把“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都转化为“直觉”问题,甚至转化为一种审美。

沙克尔主要研究创新行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选择”(creative choice),是一种不仅结果未知而且连行动也未知的选择,是所谓“生存性”的选择。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一些神秘主义意味,一种进入到未知的神秘境界的诱惑,一种来自我们人类本能的探索冲动。对未知的好奇,使人类冲动并从事探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本能的冲动,沙克尔把这种冲动叫做“选择”。

今天,脑科学告诉我们,创造性思维所激活的,恰恰是自我意识、他心理论和场景记忆这三种功能所在的脑区。另一方面,米德的研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即“主我”)是和他心想象(即“宾我”)共生演化的。没有接触过他人的人,不可能有自我意识。所以在我打算报告给大家的另一些脑科学实验中,受试者的自我意识中枢总是和他心想象的脑区同时被激活。这些实验只激活他们的自我意识而不要求受试者运用他心想象。但是,受试者自我意识被激活的同时,他心想象也被激活了。这意味着自我意识与他心想象的共生演化。

自从沙克尔死后,似乎没人再打算接着他从事这类研究了,因为这似乎不是“学术”,难以传授给学生。可是,2002年的时候,另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和一位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学者,他们两人在《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要继承沙克尔的“创造性选择”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布坎南开创的“立宪经济学”领域。

概括而言,我们从不同领域走到了同一路口处,在这里,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都被视为是基于直觉的智力活动。而脑科学的研究表明,这一智力活动总是把我们的自我意识带入温暖的场景记忆,并且运

用我们的他心想象力和社会认知能力。

根据我在下面应当介绍却没有时间介绍的十几篇论文,我可以把社会认知定义为:在给定的主体的身体状态下(基于场景记忆),在给定的符号交往和知识表达体系内(基于语义记忆),主体对他人行为和自身行为的确当性所作的道德判断(基于自我意识和他心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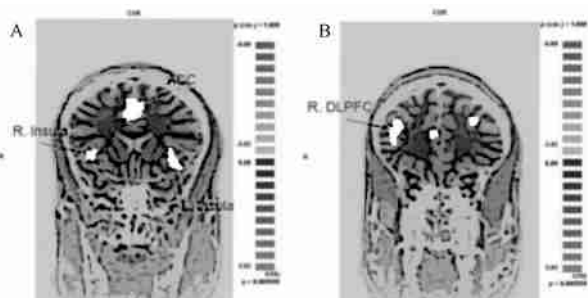
我应当尽快结束,因为再继续讲,我估计就会有人觉得枯燥,要离开会场了。不过,我请各位一定注意阅读两位作者的著作,其一是阿伦特,特别是她的最后一本著作,《心的生活》。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我特意把它译作《心智人生》。其二是叔本华的著作,他的叙事里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理解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的冲动,是包含着情感的思想活动,而纯粹的理性则缺乏这种柏格森式的冲动,没有生命的显现。其实,当代脑科学试图建构的,就是叔本华所阐释的人类理解力而不是康德所阐释的纯粹理性。

对不起,我的报告大大超过了预定时间。这个报告没有结论,因为事情本身没有结论。我只想重复我在开篇时说过的: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是相互纠缠着的。你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个结论实在是平淡无奇。但是,对于我们学院派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结论在几年前是不可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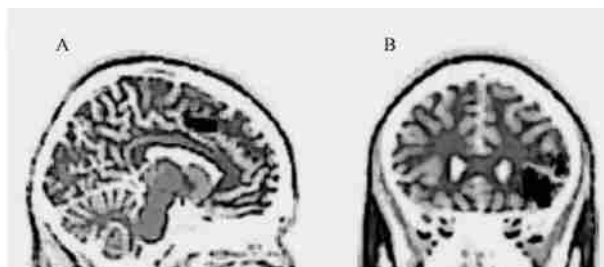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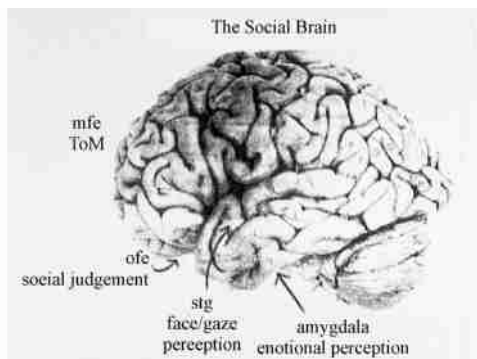
感谢大家!

附录一: A. G. Sanfey,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vol. 300, 13 June, 2003.

附录二: J. Decety & J. A. Sommerville, "Shared Representa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A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iew."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7, no. 12, December 2003.



附录三: N. I. Eisenberger, et al., "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vol. 302, no. 10, October 2003.



作者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罗琳